

能限于经济分析，是否基于“荒野精神”也颇值得怀疑。东北地区被清朝视为龙兴之地，清代中后期逐渐弛禁开垦，不过在封禁与开垦之间，耕殖者的身份至为关键。呼兰县在放垦闲荒的过程中，“向准该处旗丁耕种，而禁民户入界私垦”。^①可见，放垦仅限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旗人，普通百姓则被严令禁止。从环境正义等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某些现象与过程，无疑可深化认识，并可与原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

医学社会史的名实与研究取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化成

一、指称的纠葛及其内涵

20世纪中叶以降，特别是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了对疾病、医疗问题的研究；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中国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推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究竟该如何指称这一研究？国内学术界混杂使用“医疗社会史”、“疾病社会史”、“医疗社会文化史”、“生命医疗史”、“医疗史”等概念，这与同属新型研究但概念较为明确统一的“环境史”、“全球史”、“经济社会史”等形成了鲜明对比。指称的纠葛，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该研究领域内涵的复杂认识，也反映了相关研究的一些偏向和问题。

上述内涵突出表现在两方面：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和研究取向的史学本位论。国内学者早先多重视疾病、医疗的社会意义和影响，较为符合“医疗社会史”或“疾病社会史”之名。^②但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加之中国古典医学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学术界开始重视、提倡新文化史倾向的研究；并且，考虑到“社会史”不能包容这日趋多元的研究，学者们或称其为“医疗社会文化史”，但更多地还是倾向于称之为“医疗史”，“广义的医疗史不仅仅关注医生的医疗……的历史，也包括疾病史和医病关系史”。^③那么，与其进行狭义、广义的区分，何不采用传统的“医学史”概念呢？于赓哲指出，“这里重点在于‘疗’字……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认定医疗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有人的主观性因素在起作用，与当时、当地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故此，‘疗’字可以彰显‘人’的作用”。^④而这实际上是历史学

① 民国《呼兰县志·呼兰县大事年表》，1930年刊本，第3页a—b。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专项经费支持项目“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医学及其比较意义研究”（项目号14SZZD0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还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NCET-13-0886）的资助，匿名审稿专家和侯甬坚、俞金尧、顾奎斋等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② 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余新忠：《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导言”，第I—Ⅺ页；《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

④ 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3页。

家一直坚持和主张的。^①

但“医疗史”能否指称所有的相关研究呢?“医学史”的研究果真不能包含“人的作用”吗?二十几年来,国内史学界既有围绕个体生命展开的疾病、医疗文化史的辨析,也有聚焦于社会变迁的瘟疫史考论;既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的灾疫史发掘,也有着眼于殖民医学、文化交汇等问题的近代卫生史探究。所以,即便是广义的“医疗史”,也很难涵盖当前所有的研究。反倒是“医学史”或可担起这一职能。虽然从字面上来说,“医学”指的是一门科学,但“医学史”却从来都不是一门单纯描述医学科学(或学科)本身发展的学问,而是包含了“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②实际上,在医史学界之外,很多学者谈及上述研究时,也直接使用了“医学史”一词。^③

当然,仅用“医学史”,尚无法体现这种研究的史学本位特征。因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主要是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延伸。并且,在面对这种研究时,医史学家也往往强调其医学本位的特征。^④所以,将这种研究称为“医学社会史”可能较为合适。一方面,该名称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这也与国内学术界公认的一些命名方式一致,如“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等。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种命名更符合西方相应学术分支(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词义。但“医学社会史”能否涵盖较晚兴起的医学文化史研究呢?我们如何认识和践行这种“医学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的发展历程或可给我们以启示。

二、医学社会史的文化传统和“转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包含文化史在内的多领域的研究景象,促成并推动了西方医学社会史的诞生和发展。从17世纪医学编年史出现到19世纪中叶,已经不乏结合哲学、语言学和政治学来论述医学发展的作品。^⑤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史研究的文化色彩更加浓厚了,“对艺术和医学关系的重新探讨,好像又回到文艺复兴时代”。^⑥这种势头在20世纪上半叶依然继续。西格里斯是“医学社会史”概念的提出者(1940),但在他所理解的社会史范畴内,实际上包含了大量文化史的内容,如疾病与巫术及宗教的关系等。^⑦根据这一概念,1970年“医学社会史协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简称SSHM)在英国成立,是该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在协会成立伊始,就有声音呼吁协会“探索更宽广、更有意义的知识领域”,如“作为一种文化结果的医学”(A Product of Culture);而到了1978年,协会的发展目标已经是“促

① 参见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台北)1997年第4期;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③ 参见章梅芳、刘兵:《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2期;江晓原、刘兵:《医学史:不是科学是文化——近年七种医学史著作述评》,《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2期。

④ 廖育群:《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传统”与“革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

⑤ 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下册),程之范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74—680页。

⑥ 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下册),第1019页。

⑦ Henry E. Sigerist,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Felix Marti-Ibanez, ed., *Henry E. Sigerist o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MD Publications, 1960, p. 33.

进医学社会史所有方面的研究”了。^① 这种趋势与历史学家参与医学史的研究关系密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新史学兴起,将史学家的视线从精英拉向了芸芸众生,从政治、军事等国之大事拉向了社会生活。这就为历史学家的医学史研究开辟了道路。二战结束后,朗格、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等历史学家纷纷对疾病、卫生举止、清洁观念等进行了研究。而后,这种研究随着“新文化史”的勃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②

新文化史是“20 世纪 80、90 年代兴起的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语言决定论”。^③ 在其影响下,医学不再仅仅是科学视野中的静止客体,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符号。历史学家要研究的,往往就是这种变化的过程和意义。所以,“建构”成为一种潮流;“文本”、“诠释”、“权力”、“观念”等成为热门词汇,“精神病”、“疯癫”、“性别”、“同性恋”、“厌食”等字眼出现在诸多论著的题目中。^④ 实际上,这种文化史的研究不仅没有使医学社会史的“社会史”属性变得模糊,反而让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更加名副其实了。因为无论是医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在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时,都可以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深刻和“真实”的。“社会”已经不再仅是医学发展的背景或推手,而是和医学水乳交融般联系起来。罗森博格甚至认为,鉴于疾病的社会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我们同意它存在,疾病才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但他却进而对“医学社会史”之名提出了异议:因为医学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医学史本身就是社会史,这样再说“医学社会史”,就是“同义反复”了。^⑤ 问题是,这样一来,学者们就会将重心过度地放在文化一面,将研究导向了“制造意义、从模式到过程、对修辞的注意”,^⑥ 以至于言必称“文本”,论必称“解构”,将实证问题概念化、历史问题哲学化,让本来应该清晰的历史模糊起来。这或许是一种理想的哲学研究,但却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性”。实际上,现代医学知识,对于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⑦ 库特认为,医学社会史要获得新的发展前景,“不能仅仅通过贴上一个‘医学文化史’的新标签来做到”;“医学社会史做到极致,就是要研究被充分理解的社会权力是如何和医学知识及实践交织在一起的”。^⑧ 乔丹诺娃则力图澄清与社会建构主义

① Dorothy Porter, “The Mission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 Historical View,”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 no. 3 (December 1995), pp. 345-359.

② 参见李化成:《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四川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③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④ 参见卢德米拉·乔丹诺娃:《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第 42 页;Randall McGowen, “Identifying Them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3, no. 1 (March 1991), pp. 81-90.

⑤ Charles E. Rosenberg, “Disease in History: Frames and Framers,” *The Milbank Quarterly*, vol. 67, Suppl. 1, 1989, pp. 2-3.

⑥ 玛丽·E. 费塞尔:《从边际制造意义——新文化医学史》,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第 20 页。

⑦ 参见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年,第 10—11 页。

⑧ Roger Cooter, “After Death/After-‘Life’: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Post-Postmodernit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0, no. 3 (August 2007), pp. 444-445, 447; 库特还从概念辨析等角度对医学社会史的名实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本文的上述讨论有启发。参见施义慧:《罗杰·库特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1 期。

相关的几种误解，并重提“医学”的重要性。^①正因为此，这些学者坚持使用“医学社会史”这一概念。^②这说明，“医学文化史”的勃兴只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一种“转向”，而非对原先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丢弃。我们既要重视和借鉴这种“转向”，又不能因“转向”而“偏向”，进而丢弃“社会”和“医学”。^③

三、“社会”依然是前沿

如上所述，新文化史研究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方向，也正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方向未必反映全貌；前沿或热点的形成除了受学术借鉴的刺激外，还应考虑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两点，“社会”依然应该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前沿。

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尽管文化趋向的势头明显，但其“社会”色彩并未减弱。为了更充分和直观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对英国医学社会史协会主办的《医学社会史》杂志进行了整理和数据分析。^④首先从1988年到2013年共80期的489篇论文（除去研究综述和理论性文章）中检出有效关键词3280个，然后对其中表示研究取向的词进行分类，将制度、人口、家庭、组织等领域的词汇归为社会一类，共644个；将性别、身份、观念、建构等领域的词汇归为文化一类，共386个。然后，以5年（最后一组为6年）为单位，对这些词进行处理（即观察每一类词出现频次占全部词的比例，所有类的出现频次综合为100%），结果如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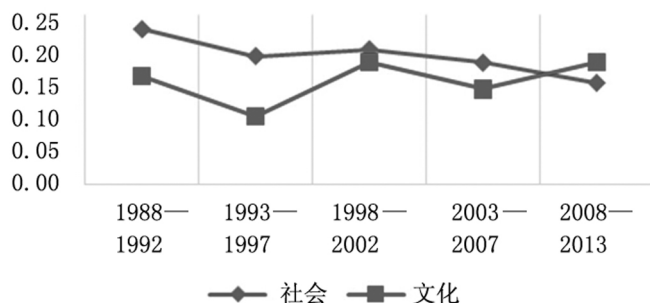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与文化关键词对比

可见，学者们对文化史的关注的确在不断增长。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其“超越”社会史词汇的时间点，都与前一部分根据研究方向所总结的情况不同。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医学文化史研究兴起的时期，90年代则是这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但在图1中，文化史词汇出现的频次直到2008—2013年才超越了社会史词汇；即便如此，后者也呈现出总体平衡的发展态势。并且，我们已经指出，文化史研究仅仅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一种新取向，并不意味着研究主题和内容的根本偏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又将表示研

① 卢德米拉·乔丹诺娃：《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第41—63页。

② 参见施义慧：《罗杰·库特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③ 实际上这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参见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④ 张光伟、郝树豪、全瑾、高阳、贾雪颢等师友在资料整理和统计中提供了诸多帮助，谨致谢忱！

研究对象的关键词分成了四类：公共健康史（375 个）、疾病史（123 个）、医疗史（219 个）和新兴领域（包括精神病史、殖民医学史、身体史等，共 82 个），并同样进行了上述归一化处理。结果如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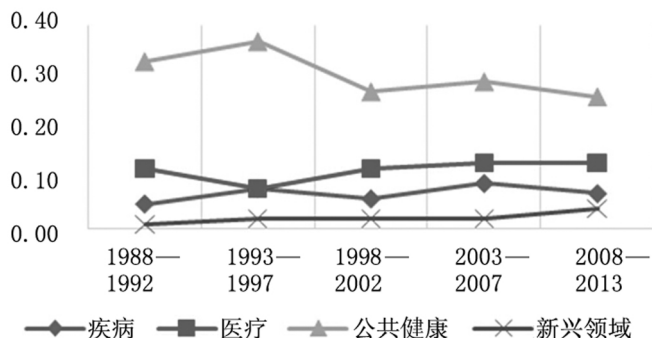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分支关键词对比

通过图 2，可以更明显地看到，尽管对新兴领域的关注度呈上升态势，但直到目前，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依然是公共健康，其次是医疗或疾病。而这三者一直是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

上述分析中“社会”主体地位的体现，不仅展现了西方医学社会史的学术实况，更提示我们要重视学术研究背后的社会推动力，以及学术本身对社会的主动关怀。作为一门关乎人类生老病死的交叉学科，医学社会史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19 世纪下半叶，医学史曾因现代科学兴起而受到冷落；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再度兴起是民族主义和文化普及推动的结果。^①而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格里斯提出“医学社会史”的论断。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这便推动了以公共健康为重点的医学史的迅猛发展；英国医学社会史协会建立的初衷也正是为公共健康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持。^②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公共健康史的研究领域被进一步拓宽了。这一方面是西方学术创新的结果，其中计量史学家、后现代主义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传统研究的质疑、修正和扩展影响深远。而更重要的是，新的疾病和医疗形势极大地影响到了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其中慢性病问题的凸显尤为重要，艾滋病便是最典型的例子。^③

上述梳理说明，西方学术前沿的产生，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学术的双重发展基础之上的。我们更要借鉴的，不是作为结果的研究问题甚至方法，而是这种问题或方法是如何出现的。西方学术界“过时”的研究，或许同样是我们当下要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在借鉴或总结西方的经验和教训方面，还是在发掘中国传统医学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上，历史学家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这种研究中，从属于哪

① 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下册），第 1019 页。

② Dorothy Porter, “The Mission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 Historical View,” pp. 345-349.

③ Dorothy Porter,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Current Themes and Approaches,” *Hygiea Internationalis*, vol. 1, no. 1, 1999, pp. 9-13; Virginia Berridge and Philip Strong, “AIDS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4, no. 1 (April 1991), pp. 129-138; Virginia Berridge, “History in Public Health; A New Development for History?” *Hygiea Internationalis*, vol. 1, no. 1, 1999, pp. 23-35.

一个学科或流派,使用哪一种理论或方法,可能都是次要的。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维度^{*}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 萍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考古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关注较多的领域,属名副其实学科交叉的产物。伴随人类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对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认知更加多元,学术研究中交叉学科的探讨逐渐加深,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究竟该如何进行?历史学者进行此项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研究意义在哪里?诸如此类问题都亟待解决。

一、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群体及价值

如果从中国城市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显然可以看出,“城市形态”一词用于史学研究是晚近的事情,使用频率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看不到这样的名词。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来看,其中又不乏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来源于三个研究群体:考古、历史、城市规划与建筑学者。^①

考古工作者关注城市形态是基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进展,众多古城的发现与发掘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些城址进行解读。据不完全统计,至21世纪初,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中国古代城址已达2000余座,其中许多重要城址历经数次调查和多年连续发掘。^②先秦时期的城市状貌依据文献记载已很难复原,但是一系列城址的发现,为学者提供了大量可视性研究资料,使研究者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城市的本来面目,为城市形态定位提供了实测基础。因此,中国近世考古学的发展是促进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主要力量,贡献极大。历史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多数集中在历史地理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侯仁之,其博士论文即为《北平历史地理》,开辟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有关城市研究的先河。^③之后侯仁之主编了《北京历史地图集》,^④史念海主编了《西安历史地图集》。^⑤学术界对于西安、洛阳、成都、扬州、南京等城市的研究不断增多,历史地理学者在关注城市发展环境基础的同时,有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成为另一重要研究对象。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需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历史进行总结,这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旧城保护的客观需求。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即为其中的代表作,系统地讨论了中国城市营建史,成为城市规划专业的教科书。^⑥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项目号14AZS011)的前期成果。

^①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曲英杰:《古代城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③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④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⑤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⑥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